

北大中文文库

陈贻焮文选

李商隐的诗，历来被认为是隐约迷离，索解不易。考辨李商隐恋爱事迹可知，他与灵都观人道公主身边的一位女冠相恋过，由于道教的清规戒律和封建礼教的现实，相见欢会之难可想而知，因此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之叹。

陈贻焮 著/钱志熙 杜晓勤 编选



陈贻焮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中文文库

陈贻焮文选

陈贻焮 著/钱志熙 杜晓勤 编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贻焮文选/陈贻焮著;钱志熙,杜晓勤编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

(北大中文文库)

ISBN 978-7-301-17349-7

I. ①陈… II. ①陈…②钱…③杜…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0905号

书 名: 陈贻焮文选

著作责任者: 陈贻焮 著 钱志熙 杜晓勤 编选

责任编辑: 吴 敏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349-7/I · 224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开本 20印张 285千字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十五年前,我写《与学者结缘》,提及“并非每个文人都经得起‘阅读’,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觅到一本绝妙好书的同时,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学者,实在是一种幸运”。所谓“结缘”,除了讨论学理是非,更希望兼及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与第一流学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结缘”,是一种提高自己趣味与境界的“捷径”。举例来说,从事现代文学或现代思想研究的,多愿意与鲁迅“结缘”,就因其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提升。

对于学生来说,与第一流学者的“结缘”是在课堂。他们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20世纪中国的“大历史”、此时此地的“小环境”,讲授者个人的学识与才情,与作为听众的学生们共同酿造了诸多充满灵气、变化莫测、让后世读者追怀不已的“文学课堂”。

如此说来,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所谓北大课堂上黄侃如何狂放,黄节怎么深沉,还有鲁迅的借题发挥等,所有这些,都只能借助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言说”。即便穷尽所有存世史料,也无法完整地“重建现场”;但搜集、稽考并解读这些零星史料,还是有助于我们“进入历史”。

时人谈论大学,喜欢引梅贻琦半个多世纪前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何为大师,除了学问渊深,还有人格魅力。记得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其实,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走出校门,让你获益无穷、一辈子无法忘怀的,不是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教授们的言谈举止,即所谓“先生的音容笑貌”是也。在我看来,那些课堂内外的朗朗笑声,那些师生间真诚的精神对话,才是最要紧的。

除了井然有序、正襟危坐的“学术史”,那些隽永的学人“侧影”与学界“闲话”,同样值得珍惜。前者见其学养,后者显出精神,长短厚薄间,互相呼应,方能显示百年老系的“英雄本色”。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若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

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森、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

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的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没错,学问乃天下之公器,可有了“师承”,有了“同窗之谊”,阅读传世佳作,以及这些书籍背后透露出来的或灿烂或惨淡的人生,则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正因此,长久凝视着百年间那些歪歪斜斜、时深时浅,但永远向前的前辈们的足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作为弟子、作为后学、作为读者,有机会与曾在北大中文系传道授业解惑的诸多先贤们“结缘”,实在幸福。

陈平原

2010年3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前言

陈贻焮先生(1924—2000),字一新,湖南省新宁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系、校学术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韵文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诗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王维研究会名誉会长,《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编委,《中华诗词》顾问等社会兼职。陈贻焮先生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他陆续出版了《王维诗选》^①、《唐诗论丛》^②、《孟浩然诗选》^③、《杜甫评传》^④、《论诗杂著》^⑤等重要著作,并参加《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⑥、《中国历代诗歌选》^⑦、《中国小说史》^⑧、《历代诗歌选》^⑨等书的编著工作,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⑩。上述的著作,无论是他个人的专著,还是参编、主编的诸书,都在学术界发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他在唐诗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工作,可以说是新时期唐诗研究领域奠定性成果之一。陈先生也因此而被海内外学界所推崇,被公认为唐诗研究方面的名家。学术研究之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7月版。

②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

③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5月版。

④ 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中、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5月版。

⑤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⑥ 与林庚、袁行霈合编,中华书局,1962年8月版。

⑦ 参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1月版。

⑧ 参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⑨ 与冯钟芸、季镇淮、倪其心合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版。

⑩ 陈先生于1995年后,因脑疾渐难董理主编事务,主要工作均为陈铁民、彭庆生两位常务副主编完成,全书五大巨册1500万字,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01年5月出齐。

外,他在古典诗词创作方面也具有很高的造诣,一生作诗填词,笔耕不辍,其作品^①将传统诗词的艺术风格与个人感情、现实生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推陈出新,在诗词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八九十年代,传统的诗词创作活动开始复苏,陈先生继夏承焘、王季思等先辈之后,经常参加诗词界的各种活动,引领风骚,被后辈奉为诗坛耆宿。

一 “因顽慕勇”的奋斗历程

和其他出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成于四五十年代的学者一样,由于战争的冲击和社会的动荡,陈先生的求学之路十分坎坷。他虽然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秀才,父亲也是一位诗人,家中亲戚如堂舅祖刘永济先生、表叔李冰若先生都是著名的学者。他认为自己从小钟爱诗词,并最终走上治学的道路,与这种家族与亲友间浓厚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但他小时候家境并不很好。初中一年级时曾因家里付不起学费而面临辍学的危机,但他自己“只想上学,想当个大学生,能个人奋斗,独立生活”^②。最后在不识字但特别重视教育的祖母^③的全力支持下,陈先生又能继续读书了。1944年,日本人打到了新宁县。因为父亲谋生在外,祖父已经逝世,作为陈家长房长孙的他,曾带着家人和亲戚二十多人,四处逃难。其间靠到处借大米,为学生补课的微薄收入来维持全家生计。高中毕业后为了还债,补贴家用,曾去长湖村斗光农校教书。在利用薪收逐渐还清了欠债后,陈先生才毅然决定出来考大学。他说自己早年经历的这种情形,很像鲍照《侍郎报满辞阁疏》中所说的:“臣蠹机穷贱,情嗜踳昧,身弱涓玆,地幽井谷。本应守业,垦畛剿茆,牧鸡圈豕,以给征赋。而幼性猖狂,因顽慕勇,释担受书,废耕学文。”他说正是鲍照说的这种“幼性猖狂,因顽慕勇”的个人奋斗精

① 已结集为《梅棣庵诗词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② 陈贻焮《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的》,《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第3页。

③ 她的堂弟是武汉大学中文系著名古典文学教授刘永济先生,外侄刘敦桢先生则是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教授、著名的古典建筑专家,都是读书有成就的人。

神，一直激励他追求文学和学术。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招生，陈先生总分够了，但数学不好，被招入北大先修班，教他国文的是傅庚生先生。因为傅先生喜欢讲《浮生六记》、《陶庵梦忆》这些美文，又加上受家乡优美景色的熏陶和诗书家风的影响，陈先生就学着写意境优美的散文，不少作文得到了傅先生的夸奖。其中一些，如《杜甫小传》等，还发表在北京的报刊上。这激发起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热情。

1947年，陈先生正式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48年底因病休学，回到新宁疗养。病愈后在本县里教了半年中学，暑假里参加农村调查，看到解放后的种种新气象，很是感动。回北京大学复学正碰上小说家废名先生教文艺文写作课，他就将在乡下的切身体会写成了短篇小说《弟弟加入少先队》交了上去。废名先生看后，特别欣赏，认为超过了赵树理，还写下了这样的评语：“写得很成功，富有地方色彩，人物个性亦强，而且都有进步性，所用语言亦好。”并把这篇文章拿到班上作为范文，组织同学重点讨论。陈先生很受鼓舞，接着又写了篇《李三阿妈》。废名先生又认为最好，评语是：“成功之作。人物都写得好，李三阿妈、黄毛、麻大爷如见其人，如闻其语，连没有写什么的扁婆、八老信、麻大妈、谭姑爷都写出来了。文字也好。还有，作者对农民生活的热诚！”在废名先生的鼓励下，陈先生又一连写了好几篇小说，都得到了好评。有一次，废名先生甚至还请来了杨振声先生来指导，这当然使陈先生分外高兴，不过压力也越来越大了。由于积累的生活底子写得差不多了，陈先生就开始硬着头皮编故事。这自然受到了真诚的、重视艺术的废名先生的严肃批评。虽然不久废名先生的课就结束了，后来废名先生也去了东北大学，但陈先生一直都在心里深深地怀念着、感激着废名先生，认为废名先生“确乎是个真诚的人，是个不失赤子之心的人”^①。陈先生从废名先生身上，不仅学到了文学创作的艺术，还学到了对艺术的严肃态度和真诚、不失赤子之心的为人。

^① 陈贻焮《附在后面——聊代自传》，《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308页。

1953年大学毕业后,陈先生留在了北大。虽然他说自己喜欢创作,也喜欢文艺理论,但系主任杨晦先生让他学文学史,并安排他师从林庚先生,一边当助教,一边主修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①在林先生的指导下,陈先生说自己“狠狠地读了三年书”。读书的方法是挨个儿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重要作家的集子及注释,还要参阅《资治通鉴》与正史中相关作家的传记,每两周交一次读书笔记。半年之后,就写出了《关于陶渊明》^②、《鲍照和他的作品》^③等学术论文。到了1957年,由于运动和社会活动的增多,学校不提倡念书了,但是陈先生仍挤出时间,照林庚先生的意思,断断续续地通读完《昭明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全唐诗》、《资治通鉴》以及《汉魏丛书》、《唐人说荟》等丛杂书。^④他说这种循序渐进的读书做笔记的方法使他受益终身,后来陆续发表的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如王维“亦官亦隐”生活方式的政治原因和深层心理^⑤、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⑥、李商隐无题诗的寓意^⑦、李贺诗歌中的“哀愤孤激之思”^⑧等,也都是在当时就已经形成的。陈先生后来正是用自己当助教时的这种读书方法来

① 陈贻焮《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的》,《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第5页。

② 1954年1月25日初稿,原载《文学遗产》增刊,1956年1月第二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409—420页。

③ 1954年11月17日完稿,原载《文学遗产》增刊,1955年9月第一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421—432页。

④ 陈贻焮《我是怎样写〈杜甫评传〉的》,手写稿,第5页,未刊。

⑤ 参其《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1955年1月11日完稿,原载《光明日报》1955年7月31日《文学遗产》第六五期;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16—125页。

⑥ 参其《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1年第3期,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55—180页。

⑦ 参其《关于李商隐》,1961年9月7日脱稿,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2年4月第2期,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33—256页。

⑧ 参其《论李贺的诗》,原载《文学遗产》增刊,1957年12月第五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10—232页。

指导研究生的。直至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几代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方向老师,仍是依照着这种方法来培养研究生,甚至包括必读书目与研读的次序。也许可以这样说,至少在本教研室、本专业方向内,这是林、陈两位先生为后人创立的一种教学经典。

5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陈先生编《王维诗选》。陈先生在接任务之后,不满足于编写一般的诗歌选注,而是深入研究分析王维的生平、思想和艺术,先后写出了《论王维的诗》^①、《王维生平事迹初探》^②等筚路蓝缕、见解深刻的论文。《王维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7月出版,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和热情赞誉。后来有外国评论家认为,陈先生的这部著作是自40年代以来,全世界王维研究领域最好的一本。^③

60年代初,陈先生曾利用业余时间,着手写作以李白、杜甫为主,反映盛唐诗人生活风貌的长篇历史小说《英灵传》。为了纪念杜甫,还在《北京文艺》1963年1月号发表了其中一章《曲江踏青》。谁知这一他自己觉得毫不起眼的文学作品,竟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招来了大字报对陈先生的无情批判和无限上纲,他说吓得他多年不敢动笔续写。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陈先生也都是小心翼翼以求避祸。但因为

① 原载《文学遗产》增刊,1956年8月第三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26—141页。

② 原载《文学遗产》增刊,1958年5月第六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03—112页。

③ 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于保玲在综述40年代到70年代海内外王维研究动态时,就特别指出:“文革前,只有陈贻焘的《王维诗选》一书出版。迄今为止,它是这方面最有价值的著作。其中,撰‘后记’36页,选诗152首;注释甚详。……‘后记’直接为诗人记传,资料既翔实,推断也稳妥。作者强调诗人对政治环境的矛盾和妥协的态度,认为直到张九龄遭贬后诗人才滋生退隐的念头;诗人事佛是出自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原因;诗人也从未绝情于官场,只是能够使自己适应种种情况而已。……在肯定王维山水诗的成就时,作者觉得我们的目光应该从它们消极的一面移开,而集中于撩人的、深刻的、现实的一面,而且作者从整体上对王维形形色色的诗作予以赞赏。文中虽然不无争辩的口吻,作者关于官隐矛盾的论述却非常出色。这篇简明的传记是最可信赖的。”(参其《王维研究与翻译近况》,刊《文学研究动态》,1983年第8期。)

有“黑五类”的出身、是解放前上的大学,并且写过“毒草”历史小说等经历,他还是经常受到红卫兵的审问和追查。然而陈先生从来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不做一件违心的事。当时担任北大中文系党委的负责人严家炎先生就特别敬重陈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陈先生自律甚严,坦诚‘向党交心’,常作自我剖析,但他严守一条:从未批判或伤害过别人。他和游国恩、林庚先生等老一辈专家一样,也是个心胸敞亮、正直诚实的老知识分子。”^①在“评法批儒”时期,毛主席所喜爱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都成了“法家”代表人物。“四人帮”别有用心地侈谈李商隐,在他的无题诗上大做文章,说李商隐的无题诗不是爱情诗,而是政治诗,表现了对法家思想的热爱。当时“梁效”(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领旨杜撰,但因对李商隐不熟,绞尽脑汁也炮制不出作品。于是,他们就想到了早在60年代初即对李商隐有过深入研究、性情随和的陈先生。他们将陈先生从劳动现场调回北大,向他下达了“战斗任务”:要尽快写论述李商隐的无题诗是拥护法家路线的政治诗的文章!陈先生却表示: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理解不够,还要好好学习。他故意半风趣半认真地说:“政治诗?我怎么看不出来呢?还得好好学习!”就这样,推托加搪塞,学习再学习,直至“四人帮”垮台,陈先生也没违心地写那篇文章。^②这样的为人行为,正是“看似寻常最奇崛”!但是,他也深为这段荒唐的岁月虚耗他的年华而深深感慨,曾说:“从1963年开始,直到1978年,我没有好好地念过书,没有做严格的科研,整整耽误了15年。下乡、开会、斗争,每天回来我就练字,

① 严家炎《怀念贻焮先生》,《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4页。

② 参见朱明伦《忆陈贻焮先生》,《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111页。陈先生在“文革”后所作《荷叶杯·夜授唐诗,犹未尽意,归赋三绝》其三谓:“无题岂尽有文章,摸象群盲笑瞎详。何物宜都太饶舌,悔贻话柄四人帮。”即言此事。其自注云:“玉溪生作《宜都内人》,于武后颇有微辞,而彼流辈妄目为颂圣,乃封为大法家。诗人若九泉有知,当亦唾弃。余以为无题之作,多因所感而发,从来亦有附会政事者。香草美人之论,固不足奇,而信口雌黄,居心叵测则叹为观止。”(《梅棣璠诗词集·攀登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8页。)

写一些诗,也算是修身养性吧。上大学时,我耽误了5年,而这15年更可惜。”^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先生倍感时光的宝贵,以空前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在70年代后期,陈先生除了编定《孟浩然诗选》^②,整理出关于孟浩然生平的长篇考证文章《孟浩然诗选后记》^③,还发表了《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④、《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⑤等考论结合、精见迭出的宏文。他从年轻时就一直想写杜甫评传,到此时已经54岁了。经过长期的反复考虑,他感到光阴荏苒,时不我待,若一再拖延,有负初衷,即“因顽慕勇”,“发大誓愿”,开始撰写《杜甫评传》。^⑥原定字数30万字,结果越写越多,从1979年3月一直写到1984年,最后写成109万字的煌煌巨著。这五年间的劳动强度相当大。他说每天都放不下,脑筋始终松弛不下来。因为终日伏案写作,左眼视力严重衰退,几乎失明,而且由于长期用脑过度,也可能导致了后来的脑疾。有朋友曾劝陈先生放慢点速度,别把身体搞坏了,陈先生说:“人过60精力就要大减,一定要在60岁前把这部书写完。”^⑦当然,陈先生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和惊人的代价,也赢得了海内外学界对《杜甫评传》这部百万巨著的高度肯定和同声赞誉。学界普遍认为,它

① 陈贻焮《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的》,《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第7页。

② 1962年夏,人民文学出版社约陈先生编注这部诗选,不久即完成初稿,后因运动起来,就一直搁置了下来。“文革”之后,出版社又来信促进,陈先生遂又着手修订,编成于1979年3月。最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3年5月出版。

③ 1979年3月完稿,原载《文艺论丛》1980年4月第10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71—82页。

④ 将近3万字,1977年11月整理,原载《文史》1979年6月第6辑,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82—324页。

⑤ 全文逾5万字,1978年3月写成,原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又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25—408页。

⑥ 陈贻焮《我是怎样写〈杜甫评传〉的》,手写稿,第8页,未刊。

⑦ 陈铁民《怀念贻焮先生》,《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7页。

是20世纪杜甫研究领域最为详尽深细的集大成著作,“堪称是当代杜诗学中的一座丰碑”^①。这部著作的上卷于1986年获北京大学首届社会科学成果著作一等奖,又于1987年获北京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获首届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用它作为开设杜甫研究专题课的主要参考书。

80年代中前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日本学者说,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没有文化了,提出要派日本学者来帮助我们。这使在场的中国学者特别是一些老先生大受刺激。陈先生对此事也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在《杜甫评传》脱稿后,立即投入到新的研究中去,陆续撰写了有关曹操诗^②、初盛唐诗人^③、盛唐绝句艺术^④等长篇论文^⑤。另外,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学术生命延续到学生身上。他曾屡次对学生们说,应当成为国际学者,学术上要敢于攻坚,要为国际同行所承认,要为我们民族争气。^⑥到90年代中期,由于患上脑疾,陈先生渐渐不能写作,但他仍坚持带病全力培养学生,直到2000年11月,陈先生因脑瘤严重恶化,医治无效逝世。值得欣慰的是,陈先生的学生现在已星布神州,执教各国,如葛晓音、张明非、柯素芝、钱志熙、罗伯特、吴光

① 莫砺锋《少陵功臣非公谁——敬悼陈贻焮先生》,《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309页。

② 即《评曹孟德诗》,1985年11月完稿,全文4万字左右,后收入《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8—72页。

③ 参见陈先生为《中国历代文学家评传》一书所写的《卢照邻》、《杜审言》、《孟浩然》、《王维》诸篇及《杜甫壮游踪迹初探》一文,均收入其《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

④ 即《盛唐七绝刍议》,1986年9月完稿,全文4万5千字左右,原载《中国韵文学刊》1987年创刊号;后收入《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13—148页。

⑤ 陈先生于1988年将这几年间写的19篇论文,加上一篇50年代的旧文,结集为《论诗杂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

⑥ 葛晓音《难忘师恩 永记师训——怀念恩师陈贻焮先生》,《陈贻焮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14页。

兴、吴相洲、杜晓勤、孙明君、金昌庆等,都已经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国际学者,他们或在大陆、香港、澳门,或在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实现着陈先生的宏愿,弘扬着中华学术。

二 “推陈出新”的学术追求

陈先生走上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之路,是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留校任教之后。当时的学术界正是新旧两种学风此消彼长、进行转化的时期。陈先在吸取前辈学术经验的基础上,加上他自己的多年摸索和刻苦钻研,推陈出新,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和治学路数。

首先,在读书方法上,他既舍得下“笨功夫”,从最基本的原始材料搞起,又会念“聪明书”,思路开阔,善于发现问题。他始终坚持,无论前人有多少成果,都必须自己下功夫从基本资料的考辨做起,所以,“他的观点不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或是受什么流行思潮的启发,而完全是通过钻研第一手材料,通过发掘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取得的”。^① 比如,人们过去常说王维最初热衷进取,后来消极隐居,是因学佛或中年丧妻。陈先生在 50 年代前期,通过阅读原始材料,发现王维官场之进退与张九龄存在密切的关系。张九龄认为,“名器不可以假人”,反对随意给有功者授予高位;还认为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地方官手里,而为苍生计,主张当政者应注意郡县地方官的选择和任用,反对当时把犯了错误的京官贬谪到地方的做法。王维作为张九龄政治主张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受到张九龄的器重和提拔,其《献始兴公诗》“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就是对张九龄政治品格的颂赞,不是一般献诗的奉承之辞。张九龄失败被贬时,王维相当沮丧,又写了一首《寄荆州张丞相》诗送给张九龄,表示他的心情和态度。这时李林甫威胁谏官,要大家像立仗马一样不声不响、老实驯服,否则身家性命难保。王维感到“举世无相识”,表示“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了。这样一来,陈先生

^① 葛晓音《通新旧之学 达古今之理——论陈贻焘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2 年第 3 期,第 122 页。

就比较深刻地解释了王维亦官亦隐生活方式的深层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篇文章^①发表后,学界普遍认为陈先生的观点既新颖又信实,马上就被多种文学史采用了。^② 60年代初期,陈先生受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作《孟浩然诗选注》,他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史传中只说孟浩然隐居鹿门山,而他的《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却说“鄙庐在郭外,素业惟田园”,而时人王士源序又说他“终于冶城南园”,那么“涧南园”就是“冶城南园”吗?他家具体地点又在哪里?陈先生首先去查各种方志,深入而全面地掌握有关的大小地名和有用的原始资料,然后再同史传和作品放在一起加以综合研究,终于解答了问题。陈先生的结论是:一、浩然祖传园庐在襄阳南郭外岷山附近江村中。因屋北有涧,又其地旧有冶城,故一名涧南园,又名冶城南园,简称“涧南园”,所以集中写南园生活和西南郭外诸胜宴游情事的诗最多;二、隐居鹿门山当在写《登鹿门山怀古》之后。孟浩然有意步武先贤庞德公,藉扬清德,故虽偶住鹿门,而仍以归隐名山相标榜。后人不察,就不知有涧南园,更不知它在岷山附近了。另一个问题,孟浩然与同乡好友张子容过从甚密,但是自他们二人越中相别之后,孟集中似乎很难再找到张子容的踪迹了。那么,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再见面了呢?陈先生考出集中所谓“张明府”、“张郎中”就是张子容,并根据孟浩然诗题中“钱卢明府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的线索,参照史实,进一步推算出孟浩然“自洛之越”和自越还乡大致可信的时间,写成《孟浩然事迹考辨》一文,发表于《文史》第四辑,颇受海内外学术界好评。^③

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除了新挖掘出来的文物以外,新材料很少,绝大部分是人所共见的材料。但是陈先生善于从常见材料中看出新问题,也即会“念聪明书”。陈先生的《杜

① 陈贻焮《王维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1955年1月11日完稿,原载《光明日报》1955年7月31日《文学遗产》第65期;后收入《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116—125页。

② 陈贻焮《我是怎样学习和研究的》,《文史知识》1989年第7期,第6页。

③ 陈贻焮《书海拾贝》,手写稿,第1—4页,未刊。

甫壮游踪迹初探》^①一文就是这样的范例。该文的做法是排比杜甫晚年回忆青年时期经历的诗歌,证以同时代诗人李白、高适的活动,从许多看似毫无关联的诗歌中勾稽出杜甫天宝四载以前的游踪和相关事迹,使杜甫生平中最不清楚的这一段经历有了头绪分明的交代。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陈先生善于排比材料,归纳问题,总结规律。而这又得益于他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历史辩证法。

具体到怎样分析和评价古代作家方面,陈先生认为,很多问题要从根本上去想,不要满足于一些现象的罗列,要找出它的原因。读书时应尽量拨开种种表面的伪装,要善于从前人僵化的评论中发现真正的东西。我们与古人的时代离得很远,但总要努力了解古人的生活环境、社会风尚。从作家和他的朋友、亲属及各种人的关系中去研究他的思想面貌,不要简单化,人是复杂的。“知人论世”,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是为了讲公道话,不是充当古人的辩护士;要用历史辩证法去分析评价,掌握分寸。^②如曹操其人其诗,向来很难评价,一则因为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二则因为曹操具有政治上的特殊性和性格上的复杂性。陈先生的《评曹孟德诗》^③利用现存诗文和史料与前人评价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将曹操学周文王、齐桓、晋文之事、提倡“礼让”以“厉俗”之举,与其性格的诡谲多变和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联系起来分析,指出曹操的真与假是不矛盾的。^④再如,陈先生在指导学生研究曹植时,就告诫道:“不要太廉价地同情他。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曹植当了皇帝,又会怎么样?曹丕的智囊团比曹植的厉害,曹植才失败了。他的失败是在家族内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产生的悲剧,是封建王朝内部争权夺利的历史悲剧在他身上的重演”,“曹植一再表态要当周公,想以骨肉之

① 原载《文史》第14辑,后收入其《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11—262页。

② 陈贻焮《漫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大学生》1981年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66页。

③ 见《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8—72页。

④ 葛晓音《通新旧之学 达古今之理——论陈贻焮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第126—127页。